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7.03.0011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米 臻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纳文入史;《文选》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3-0064-05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以此为基础,经、子、集三部中的文献都被他赋予了史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成为了他对典籍进行褒贬取舍的标准。对于集部文献而言,章学诚认为其价值在于“与史相辅”:“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1]766}章学诚所推崇的“大部总选”,主要是《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1]39}这样就把原属于集部的文集纳入了自己的史学理念之中,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章学诚首先将文集置于“道—六经—战国之文”的史学体系中,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另外,在章学诚看来“《文选》之体”则是“纳文入史”观实际运用的范例。

一、“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

诸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这些文集能够“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其理论依据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书》亡而入《春秋》的历史渊源。在《文史通义·书教》上、中篇,章学诚认为《周官》之法未废时,因依托于完备的官礼制度,典、谟、训、诰、贡、范这些文章,能够“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1]30},其存在形态便是《尚书》,并且它们天生具有记载史事与制度的历史文献属性。当官礼法废,上述文章便无法单独存在,进入了《春秋》

“比事以属辞”的记载之中。而典、谟、训、诰、贡、范,发展到后来,便是常编次于纪传史中的“君上诏诰、臣工奏章”这一类文体。当“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之后,就有必要把它们单独摘出,裒成文集。这是章学诚通过对存在形态的梳理,将文集的源头上溯到了《尚书》。但这只是展现出了文集的一种史学渊源,尚未涉及文集“与史相辅”的具体角度以及与史存在何种内在的关联。《文史通义·诗教》则通过“道—六经—战国之文—后世文集”这一史学体系的构建,将文集纳入进来,并揭示了文集史学价值的理论基础所在。

在章学诚的史学体系中,“道”是一切的源头。他对六经的定位,则是“六经皆器”,“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1]123}。而道的存在形式,便是“羲、农、轩、颢之制作”,然后后圣法前圣,代代相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1]112}。其实指的就是先王政教,这就使“道”带有了史的色彩,故而言“六经皆史”,“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1]124}。战国诸子与六经,正是通过“道”搭建起了关系:

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米 臻(1991—),男,山东新泰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与文论。

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1]58}

章学诚这一观点并非原创,关于诸子与六艺或者王道的关系,早在《庄子·天下篇》中就有表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2]《汉书·艺文志》引《七略》,以为九流十家皆出于古之王官,乃“王道既微”后“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3]而成。章学诚则对所谓“一端”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诸子所得之“一端”,便是“其所本”,也就是其学说能够成立的一种内在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支撑学说建立起来的一种框架体系,即如章太炎所说“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4]101-102}中的“义”。这一内在的“义”便是诸子各家的核心与根本,而非外在的文辞。章学诚又举各家之例加以说明,如《老子》所讲为阴阳有无,其义出于《周易》;邹衍讲天地之事,关乎推演五行,其义出于《尚书》之《禹贡》《洪范》;管仲、商鞅讲法,义出于《礼》;申韩刑名,则源于《春秋》正名之义。六艺又与道相关,其所具有的认知、记录、解释“道”或者先王政教的方法与角度,为诸子学派各所继承。于是战国诸子之文也就带有了史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史与道与先王政教三者是统一的。章学诚在《诗教下》也提到:“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1]75}在这里,他更为直接地将诸子归于古代王官之“职掌”,也就是职能,而古之王官的职能,“《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正是要“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1]29}。

在阐明六艺与战国之文的关系后,章学诚又进一步论述战国之文与后世文集的关系——“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1]57},他是从文体的角度找到了两者的关联。

章学诚认为,战国之文的出现,是一种势不得已的历史必然。在三代盛时,因官师相守,典章制度可以口耳相传,但到战国之时,“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1]60}。战国之文实有两个方面:一为辞,一为体。如若“惟以好尚逐于文辞”,这是章学诚极为痛斥的,他所看重的,是上文所言之源于六经的对“道”与先王政教的认知、记录与理解,即“述旧闻”,此为战国之文的核心。这一部分内容在后世的流衍,便是“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

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即为“体”。章学诚认为,战国以后专门之学废,不只三代盛时的官礼制度湮灭无闻,连战国诸子那种专门子术之书也不存在。战国之文的核心,便发生了这种“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1]59}的转变。经义、传记、论辨,便是后世文集的三类文体,它们是战国专门之学的变体,同时也继承了由六艺到战国诸子之文所流传下来的记史功能。虽然专门之学废、“专家”不在,但核心仍存,只不过外在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除此三种外,文集中还有“辞章之属”,这一类文体以诗赋为代表,接近于现今所说的纯文学文体。即便如此,章学诚也认为它备于战国,并且同样具有史的特质。

首先,章学诚把战国文章归于先王礼乐之变。礼之变,是诸子中专门治术者,如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百家驰说,达其情志、归于《诗》者,属乐之变,因“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达其情志”,便是后世辞章之源,即本于《诗》教,故仍不脱“六经皆史”的核心论点。所以他说“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1]75}。其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是从布道宣教的角度,多次直接将诗赋等文体上溯至战国诸子或六艺,将三者并入同一体系,再次以“道”或先王政教前后贯穿,反对偏重辞藻。比如《诗教上》中罗列《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另外还有:

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1]76}

诗赋者,六义之遗。^{[1]642}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于司乐,篇什叙于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1]724-725}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1]967}

于是,后世文集的四类文体——经义、传记、论辨、辞章——都被赋予了史的意义,故而文集也就具有了“与史相辅”的功能作用。这就是文集史学价值的理论基础所在。

二、《文选》之体与“纳文入史”观的实际运用

《文选》成书之后,在很多情况下是以文学总集的性质为人所认知和接受,尤其是《文选·序》中阐述其选文标准时明言要把经、史、子三类文章排除在外,再加上众所周知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似乎与章学诚的“纳文入史”观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也造成了章学诚对《文选》以否定、排除为主要态度的印象。诚然,“《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

藻,不征实事”^{[1]532},“淆乱芜秽,不可殚诂”^{[1]78},此类评价在《文史通义》中时常可见,但事实上章学诚对《文选》的态度绝非一无所取、全盘否定。在其“纳文入史”观的实际运用中,《文选》以其兼览八代、汇聚各体的选文体例,成为后世文集以及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一个范本。“《文选》之体”,便是《文选》为章学诚所借鉴的最大的史学价值。

《文选》为现存第一部综合性文学选集,其选文特点有二:首先是时间跨越古今,从先秦一直到萧梁,“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5];其次是文体丰富,除《文选·序》所明言不取的经、史、子三类文章,所收三十九种^①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的常见文体,并且编排方法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4]3}。《文选》选文与编排之特点,一为时,一为体,正与章学诚所主张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相契合。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开篇便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与他在《文史通义》开篇所提出的“六经皆史”观一起构成了他史学观与史学方法的基本内涵。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自刘向刘歆父子在《七略》《别录》中的部次条别之法,又可进一步追溯至《周官》之遗法,若换一种表述便是“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1]277}。其要点有二:一是“聚古今”,实为由今溯古,寻找古之源头;二是“别其家”,此为由古至今,梳理支脉流别。在《校雠通义·原道》中章学诚说:“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869}这同样是在强调溯古与流别,从而能“宣明大道”。于是《文选》强调“时”与“体”的选文特点就与此产生了契合。《文选》之文兼览八代,便是“聚古今”;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便是“别其家”。加之《文选》还将两方面统一起来,即“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不仅《文选》之文如此编排,《文选·序》还从理论上梳理了各种文体的发展流变,以古《诗》之义为起始,逐渐生发出了后世的诗赋以及颂、箴、论、铭等其他文体,所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

正是出于对《文选》选文与编排特点的认可,章学诚才拈出了“《文选》之体”这一概念,以之作为后世文章选集与自己编纂县志文征的范例。章学诚多次把《文选》与他所推崇的可补史之不足的《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相提并论,比如:

自孔逵《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至于

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1]640}

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于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1]721}

故昭明以后,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括代总选,雅俗互陈,凡以辅正史,广见闻,昭文章也。^{[1]781}

由上可知,在章学诚看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是处于同一体系、一脉相承而来的,它们的共同点便是“括代选文,广搜众体”,这也就是在《文选》中首先体现出来的求时之备与体之全。《文选》时间上兼览八代,《文粹》《文鉴》《文类》则是专收一代,两者的意义是相当的,皆是求全。如从文章的编排来看,后代文集对《文选》的继承更加明显。《文选》先赋后诗,后是骚、七,继之以诏、册、表、上书等公文文体,然后是书信类,再就是论,最后是诔、哀、碑等哀祭文类。不只是重要文体同为唐宋元文集收录,就连文体编排的先后顺序也大致相同。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在章学诚看来,这几部文集是存有优劣之别的,越往后其体例就越完备,与史相辅的功能就越突出。《文选》是“意在文藻,不征实事”,《唐文粹》《宋文鉴》则是“于史事未甚亲切”^{[1]640},《元文类》才能够“每存史意”“欲为史翼”。首先,需要承认成书最早的《文选》确实逊于后世的几种文集,因萧梁时期,传记类文学尚多依附于史部文献,如《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之霸史、旧事、杂传、地理之记等。到唐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传记类文学才以单篇独立的形式蔚为大观,被广泛地收入文集。其次,章学诚对各个文集所下的断语,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各文集的序言,事实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他认为《文选》“意在文藻,不征实事”,无非是受《文选·序》中不收经、史、子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影响;以为《元文类》“欲为史翼”,则是因为陈旅在《元文类·序》中说“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6],这正合章学诚口味。其实章学诚自己说得也很清楚:“至于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1]640}而《宋文鉴》处于两者之间,除了“于史事未甚亲切”外,章学诚还认为它“循流溯源,推而达于治道”,其原因大概就是周必大《宋文鉴·序》中提到“谓篇帙繁夥,难于遍览,思择有补治道者,表

而出之”^[7],此即为“达于治道”所出;但又没有像《元文类》那般明言要“补翼史氏”,故又言其“于史事未甚亲切”。若从实际情形来看,即如“补翼史氏”的《元文类》,其所收之文与《文选》选文从题材内容上看并无多大差别,序文中“有补治道”“补翼史氏”,多是编者为进呈朝廷的一种冠冕堂皇之言,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并且章学诚对《文选》“意在文藻”之评也不甚妥当,辞藻确实是《文选》选文的一大特点,但这并非选文的唯一标准,《文选》的性质也绝不只是单纯的一部只重辞藻的文学选集这么简单。

虽然章学诚在对这几种文集进行评价时表现出了一定的主观臆断与混乱,但贯穿于各文集集中的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相契合的选文与编排方法却一直为章学诚所坚持。他甚至因此而为《文选》辩护:

夫踵事增华,后来易为力;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创,与马迁略同。由六朝视两汉,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则子夏《诗序》,屈子《离骚》而外,无他策焉。亦犹天汉视先秦,略已,周则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则本纪略载而外,不更详焉。昭明兼八代,《史记》采三古,而又当创事,故例疏而文约。^{[1]766}

他认为《文选》例疏而文约,即指文体少且文章不备,原因就是“昭明草创”。《文选》为开山之作,体例不全可以理解,且由六朝视先秦两汉,年代久远,本来所存之文就少。章学诚还以《文选》与《史记》相类比,《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亦为体例开山之作,且章学诚对《史记》评价甚高,以为“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1]48}。拿《史记》为《文选》开脱,在弱化了《文选》缺陷的同时,又强调了其体例上的贡献。章学诚又在下文以一种通达之观,指出虽然《文选》例疏文约,但后世文集仍沿其所开创的体例,继续加以完备:“《文苑》之补载陈隋,则续昭明之未备;《文鉴》之并收制科,则广昭明之未登。”^{[1]766}

另外,章学诚在自己编纂地方县志文征时,也是仿照《文选》:“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1]529}他在《修志十议》第四“议征文”中说:“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1]772}很明显,他所指的“《文选》之体”,正是与源于《七略》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相契合的按文体编选文章的方法。这也可从其《和州文章序例》《永清县志文征序例》

中按文体将文献划分为奏议、征述或征实、论著或论说、诗赋四类得到证明。

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础对《文选》体例加以肯定、继承,但他也以此为本对《文选》有所批评,尤以《诗教下》中的措辞最为激烈,指斥《文选》“淆乱芜秽,不可殚诂”。其实两者并不矛盾,章学诚对《文选》的批评,也与他文集的批评相关。

章学诚认为初本无汇次诸体、哀而为文集者,如两《汉书》等史书所记,只是篇目,或仅罗列诗、赋、碑等若干篇。在此之时,文章的创作依然“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1]276},也就是还能够据体而循其流、溯其源,追及周秦诸子,源与流的关系依然可以寻绎。直到挚虞创为《文章流别集》,文集之名始起。至于后来,便出现了“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1]277}。章学诚在此指的文集主要是别集,他认为有两种文章掺入其中:一是粗制滥造、不伦不类之文,二是矜情饰貌、滥于文辞之文。带来的后果,便是这些不伦不类、矜情饰貌的文章打乱了以前清晰的源、流脉络,公私相交、诚伪难判,所以“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1]277}。《文选》作为总集,所出现的问题与此相同。因拘于形貌,《文选》对所收之文强行划分、创造文体,如“颂”体之外分出“符命”,“史论”之外别出“史述赞”;贾谊《过秦论》与曹丕《论文》本为子书篇目,但《文选》又改子为集,强行将其纳入“论”体;《答客难》《七林》一类本属设问,但又另分成“难”与“七”体。在章学诚看来,这些都是打乱古学源流、带来混乱的行为,有悖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原则。但章学诚并未就此否定《文选》的体例,他只是批评在既成体例之下,拘于形貌、选文失当的问题。所以他说:“《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诂;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1]78}一方面称《文选》是文集之准则,另一方面又言其破坏了古人之流别。

三、结语

在章学诚对文集史学价值的论述中,“文体”是暗含于其中的关键因素。首先,后世文集集中的四类文体,承载了由六艺到战国诸子之文所流传下来的记史功能,并由此形成了“道—六经—战国—文—后世文集”的史学体系。其次,文集中以文体为次序编排文章,符合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

历史方法,因而能够“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分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1]278}。这两点,也体现出了章学诚的一种文体功用观念。

注释:

①《文选》文体分类有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种之说,此处从傅刚先生观点,定为三十九种。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3:937.
[3]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6.
[4] 章太炎. 国故论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 萧统. 昭明文选·序[M]. 李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
[6] 任继愈. 中华传世文选·元文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301.
[7] 吕祖谦. 宋文鉴·序[M]. 齐治平,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1.

责任编辑:夏畅兰

Discussion About Zhang Xuecheng's View on Incorporating Corpus into History

MI Zhen

(Literature Institut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In Zhang Xuecheng's opinion, the value of corpus lies in complementing with history. This forms a concept of "incorporating corpus into history" and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orpus.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six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y", he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incorporating corpus into history". The literary form is the key of incorporating corpus into the system of "Dao—six kinds of Confucian classics—articl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econdly, *Wen Xuan* collected articles of various literary form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arranged them according to literary forms. This agrees with his historical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 e. "categorize according to academic schools and examine the source and course". *Wen Xuan* has become an example of corpus and county annals in the later ages. Reference to the regulations of *Wen Xuan* is a key link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corporating corpus into history".

Key words: Zhang Xuecheng; six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y; categorize according to academic schools; examine the source and course; incorporating corpus into history; *Wen Xuan*